

释“饮”:以酒为中心的哲学分析

潘斌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饮”是人之生活的基本形式,以“饮”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形态彰显了生命的本源与意义。“饮”与“酒”在字形上同义同源,它的字形流变反映了饮食活动背后的文化嬗变脉络。“饮酒”本身归属于饮食活动,“饮酒”即为“吃酒”,但从“饮酒”到“喝酒”是从基本的饮水进食生理活动提升为复杂的精神生活。古人“凡祭必饮”“凡饮必酒”,饮酒承载了多元的文化面向,激活了礼乐文明的内在活力。饮酒与礼乐之间形成了二元张力,一方面因酒成礼、礼随酒兴,另一方面以饮为礼、酒礼有序。因此,构建合理有序的饮酒文化有利于激发公共生活的活力,培育成熟理性的公共精神。

[关键词] 饮; 酒; 祭祀; 礼乐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3)01-0088-09

“饮”是人之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从作为一般生活方式的饮水、饮酒、饮用到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饮食、饮品、饮料,凡人之生存“无不可无饮”,“离饮”或“不饮”既是对人之本质的背离,也是对生命活动的否定,质言之“饮”是人之生命形式的奠基与生活意义的彰显。“饮”虽是人之生活常态,但对“为何而饮”这一根本性追问尚未有来自哲学的专门应答,对“如何饮之”亦缺乏审慎合理的形上阐释,对何谓“饮之本义”更是存在诸多误解、误读与误用,亟待从概念谱系、语用环境与价值规范的层面进行形上阐释。细究起来,“饮”的语词起源与核心问题紧密围绕着“酒”而展开,从“饮”与“酒”的内在张力与二元互动的视角理解“饮”的本质意涵,有助于拓展与深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形上阐释。

一、“饮”字格义:字形源流与语用变迁

从字源学上考察,“饮”字是汉语常用字,最早见于西周甲骨文,后又在金文、六国古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楷书等中国重要的书法史均有表现。从“饮”的字体流变史可以窥见“酒”之于“饮”的重要性:

就“饮”的字形演变脉络而言,呈现为三个阶段性特征:第一、象形造字阶段。殷商时期“饮”字为象形字,对照“饮”字形演变流程图(图 1),可发现字形 1、2、3 的左边被描绘为类似坛子的容器,右

[收稿日期] 2022—05—10

[基金项目] 贵州省 2020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重大课题“中国酒精神研究”(20GZGX0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潘斌(1978—),男,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智慧研究院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基础理论、文化哲学。

飲(饮)

yǐn 影纽、侵部;影纽、寢韵、於锦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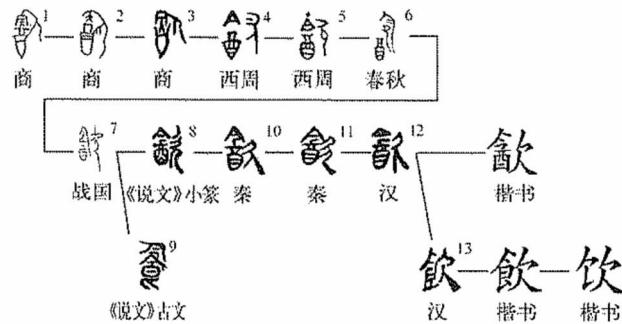


图1 “饮”字形演变流程图^{[1]773}

边都是面向容器俯身探饮的人,特别是从图中1到3呈现出线条轨迹更加清晰、图案更加具体。象形式的“饮”字表征着古人将“饮”作为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俯身恭迎意味着对其重视、尊重。第二、会意构字阶段。文字的最早实物化记载是甲骨文,在西周甲骨文(图1之4、5)中“酉”字是作为容器的坛子,本义是酒器,引申喻指“酒”,且“酉”字读音近于“就”。“就”字意“成熟”。在天干地支中“酉”指第十二地支的第十位,在十二生肖中属相为“鸡”,在地支计事法中指向的是下午5时正至下午7时正,这时作为家禽代表的“鸡”开始归巢。“酉”字表示“八月黍成”,意为适合酿酒、酎酒的时节。这一时期“饮”字的图案增加了花纹,“酉”字上方形成了一个类似“A”字的房顶,将“酉”这一酿酒、饮酒行为植入特定的空间之中,右边则是一个人朝向酒坛作品尝、舔饮状。到了春秋金文(图1之6)时期“饮”字变成左边是“酉”,右边是身着华服、恭敬庄重而作饮酒状的人,这与这一时期酒祭文化密切相关。商周时代著名的“四羊方尊”就是祭祀时用于盛酒的青铜器皿,其圆形、鼓腹、大口的工艺造型与“酉”的字形构造基本一致。古人有“祭必酒,酒必祭”,《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2]268}春秋时期“饮”的字形书写是对酒祭文化的典型表达,“祭酒”成为一个民间与官方都高度认可的职位,主持飨宴中的酙酒祭神活动的人可成为“祭酒”,他作为首脑主持仪式,通常都是其先饮一杯或带领大家共同举杯饮酒,表示仪式的开端并宣示饮酒活动的礼乐宗旨,也能控制宴饮的节奏与酒的总量,以便不至于酗酒、醉饮或滥饮,避免发生因饮酒而可能导致的亵渎神明、伤身害体、耽人误事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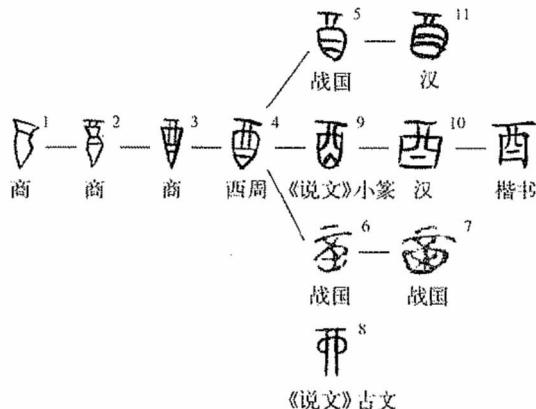


图2 “酉”字形演变流程图^{[1]1287}

第三,形声字阶段。自战国至汉末,“饮”的字形逐渐从象形字转向形声字,(歛)歛也(yǐn),从欠龠(yǐn)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考证认为,对《周易·蒙卦》虞注解读“歛”字语义为:“水流入口为饮。引伸之、可饮之物谓之饮,如《周礼》四饮是也。与人饮之谓之饮,俗读去声,如左传饮之酒是也。又消纳无迹谓之饮,《汉书》朱家传饮其德犹隐其德也。”^{[3]1287}从象形字、会意字到形声字的演变,“饮”字在语义内涵逐渐稳定时也发生了从神圣化、抽象化到大众化的转变,“饮”的实践应用也从以往只是在祭奠先祖、敬鬼拜神时的专门仪式扩展为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形式,饮酒从早期专属于贵族首领的特权而逐渐泛化为包括市井百姓在内都能享有的平凡生活。

“饮”的字形流变史与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乎同步,每一种字形的历史嬗变映衬出特定时代境遇下的社会环境、公众心理与文化风尚。围绕“饮”为中心的饮食活动既是个体日常的生活形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写照,更是映射中华文明的多元面向与博大精深。

二、从“饮食”到“饮酒”:饮的文化转向

“饮”与“酒”在字形上同义同源,共同以“酉”作为基本词根,古人造字时指认“饮”的对象应包含“酒”在内,或者至少以“酒”为主体。“民以食为天”,食为古人生活的首要问题,“饮食”是其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对“饮食”一词的源流考证则更是支撑了“饮食”与“饮酒”的本质关联。

(一)饮酒即饮食。饮食是人类生存与世代延续的首要前提与根本保障,从个体生息、族群繁衍到社会治理、国家运行,饮食的水平与质量是根本性前提。自人类产生以来,生产方式变革的直接对象与首要目的是探求如何获得更加丰富与优质的饮食资源,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也着重致力于优化食物获取方式与提升食物营养质量,重大战争与社会危机也常与对包含饮食在内重要资源的争夺而展开。饮酒作为饮食活动的基本形式对于充实人类精神、稳定社会秩序与追求美好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先秦时期,“饮酒”是一种庄重高贵的“饮食”行为,“饮酒”是这一时期“饮食”活动的象征仪式与核心元素,饮酒之于饮食,虽非不可或缺,但缺乏“饮酒”的饮食活动流俗为普通的吃喝生理活动。在中国古人那里无酒不成席”是基本的待客之道,孔融曾言:“座上客常满,樽(杯)中酒不空”^[4];宋代诗人赵友直在《赠行》中写道:“无酒不成别,无诗别不成。别君诗一首,马上酒三行。”古人饮酒活动流程中纳入了斟酒、敬酒、祝酒等仪式,这一看似繁琐的环节却承载了重要的文化内涵与礼乐意蕴,它使得饮食活动超越了简单的生命体进食行为,以饮酒为中心构建了独特的文化生活。虽然饮食活动是基本的日常生活形态,但潜移默化之间不断与社会交往、公共领域相互渗透,饮食活动沉淀丰富而深邃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内容。一言蔽之,食中有乐,烹以言志,饮酒有礼,饮酒或饮食承载着人情世故、经济往来、社会差序与伦理习俗,甚至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的酝酿也发生在饮酒这一独特的公共生活之中。

(二)饮酒即“吃酒”。“吃酒”一词常见于古代汉语,“饮酒”常见于现代汉语,偶见于古代诗歌,如李白《将进酒》:“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5]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武松在过景阳岗时遇到“三碗不过冈”的招牌,与店家有一段对话如下:

酒家道:“俺家的酒,虽是村酒,却比得上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因此唤做‘三碗不过冈’。若是过往客人到此,只吃三碗,更不再问。”

武松笑道:“原来恁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醉?”^[6]

类似以“吃酒”指称饮酒行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比比皆是,究其缘由与酒体形态密切相关。与现在我们常用蒸馏法所制作的清澈透明的白酒不同,古人在制酒技术不发达时采用了纯粮发酵法,

这一自然发酵方式制酒需要生酵母,持续发酵产生二氧化碳,酒体中混有酒糟,故显得浑浊则称之为浊酒。《三国演义》开篇即云:“一壶浊酒喜相逢”,范仲淹《渔家傲》曰:“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陆游在《沁园春·三荣横溪阁小宴》中写道:“浊酒一尊和泪斟”等等,浊酒长期成为古代中国白酒酒体的主要形态。如果将酒体进行过滤与放置可以得到相对清晰的液体,则称之为清酒。古人制酒技术落后时所酿制的酒度数较低,最高不过二十度,大多数是十度左右的米酒,故能出现大碗饮酒、开怀畅饮的情形。在古人看来,十度左右的米酒是作为粮食制作的液体食品,与米饭、牛羊肉等其他食物本质无异,自然视饮酒为吃酒。

(三)饮酒非“喝酒”。现代汉语中“喝酒”与“饮酒”常被不加区分地等同使用,而二者之间在语义流变与语用内涵上存在着本质性差异。从字源学上考察,“喝”字本义就是口渴,现代已被“渴”取代,喝水的缘由就是因为口干舌燥而将水吸入胃中,也即是说“喝”是因为生理性需求而激发的欲望,相应地“喝水”就是生命体通过口腔摄入水分的普通过程。“喝酒”是类似“喝水”的行为,将酒液吸收入胃部的生命运动过程,但显然喝酒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渴,现今混淆使用只是语义方便的缘由,但我们不应遗忘“饮酒”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价值维度。如果需要赋予“喝酒”这一行为更多的礼乐面向,则需将其置入特定的语境与情境,即要从喝酒的缘由、方式、对象、程度与意图等维度探究喝酒这一行为本身所承载的意义与目的,这其中既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的豪迈之气,也有“把酒思闲事,春愁谁最深”(白居易《把酒思闲事二首》)的愁思忧伤,还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人生叹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喝酒行为已经从简单的饮水进食活动提升为复杂的精神生活,饮酒的缘由既非口干舌燥饥渴所致,也非嗜酒寻醉的自我麻醉,而是或基于个体心境、人生际遇所感染,或是受时局环境、人事天命所影响,在饮酒的生命活动中慰藉心灵、感慨人生与思考社会。

藉此而言,从作为基本生理行为的“喝酒”转化为承载文化意涵与精神旨趣的“饮酒”,是个体的自我心境、社会认知与交往方式的深刻转型,个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由追求在感性而丰富的饮酒活动中敞开了生存的多元面向。它在两个层面呈现出独特的价值意蕴,具体言之:一是从客体化的对象性活动转化为主体化的社会性交往。如果说“喝酒”是人与对象世界的客观化的物质交换过程,“饮酒”则是人以物(酒)为中介而与他人、社会和自我进行的交往,“酒”作为媒介在这一高度主观化、情境化的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二是从作为生命活动的“喝酒”转向为文化活动的“饮酒”。“喝酒”作为一种平凡的日常生活,难免关联到口腹之欲、酒肉之嫌,但喝酒行为本身是对人类生命意识的实践自觉,表明物产的丰盈与心境的洒脱,意味着人类在满足衣食这一前提保障之外对世界提出了更高要求并设法去满足。为此,围绕着“如何喝到更好的酒”与“如何更好地喝酒”等系列性问题随之而生,正是在“喝酒”这一问题链上持续展开的理论思考与生活实践,进而反思与建构了“饮酒”的文化生活。“饮酒”建基于“喝酒”之上又对其不断超越与扬弃,从喝酒到饮酒的转型是人们将对酒的消费不断从生命性活动转向为承载意义与价值的文化活动,合理而健康地饮酒正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

三、“饮”的多元面向:茶酒并行

“天下无一物无礼乐”,礼乐是社会生活良性运行、活泼有序的习俗规范,古代儒者追求礼乐生活表达了他们对良善社会的真诚向往与不懈追求,到了现代社会经由返本开新后的礼乐规范也可

发挥经国序民、教化正俗、培养人格、礼乐善心的积极作用。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之邦”，中华文化被誉为“礼乐文化”，礼乐生活是中华文化的现实表达与具体显现，正是在礼乐生活世界里中华文化的特质与精神才得以传承。在西周时期礼乐形式主要是指音乐与礼仪，据《仪礼》记载，“周公制礼”之后周初的礼仪内容有十七项之多，包括士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朝觐礼、丧礼、祭礼、凶礼、军礼、宾礼等。“饮”在礼的形式化表达中占据重要地位，十七项之多的礼仪形式大部分都与饮食各类酒水或食物相关。“饮”成为实现礼仪的表达形式，成为早期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围绕着“如何饮”特别是“饮酒”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礼仪秩序。

春秋以来“凡祭必饮”“凡饮必酒”的惯例表达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神圣形式之间的内在张力，所谓“凡祭必饮”首先是指神饮，“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神而后礼”。^[2]^[724]但神无法直接以肉体现身，因此产生以“饮”为“鬯”的礼乐形式，即“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去，若神饮之”，^[7]这被称之为“神饮”。“神饮”是古代祭祀时“以神享酒”的庄重仪式，具体程序是将茅草捆扎在一起而立于祭祀对象之前，然后将酒缓慢浇入茅草之上，酒则逐渐渗透其中，祭酒则宣称神已饮酒完毕，诸位可以在神带领之下开始畅饮，后形成“酒以成礼”的祭礼文化。“神饮”是祭神的核心仪式，虽然神不会直接现身，但它以饮酒的形式与普通人交往，神饮是人饮的先导与规范，人饮既是表达对神的信仰与驯服，也是以饮酒的形式获得神的恩赐与庇佑。正是通过“饮酒”这一行为，天、地、神、人获得关联与沟通，人获得神的庇护而有资格通行于天地之间，又须按时节以酒礼的仪式来回报与祭奠神的庇佑，殷商祭祀崇酒的风俗亦由此而来。王权政体建立之后，君也加入这一循环序列之中，经由“饮酒”为中介在天、地、神、君、人之间建立了逻辑关联，也为王政治理提供了正当性理据。

殷商早期粮食产量较低，酿酒技术落后，酒又是极其重要的通神之物，因此酒具有稀缺性，普通人饮酒当属奢侈之事。到西周时作为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胞弟的周公旦制作并颁布了《酒诰》，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方禁酒令，主要是规劝人们不要私自酿酒与酗酒。禁酒的缘由无非有二：一是“殷鉴”之故，商朝朝野上下祭祀成风且奢靡铺张，“酒池肉林”更是为史书所斥，周王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而主张公开禁酒，既禁止个人私自酿酒，更禁止公开饮酒，除非国家祭祀所需。二是减少粮食损耗。早期社会酿酒技术落后，酒的度数较低，在口粮都较为短缺的情况下耗费大量粮食酿酒不利于繁衍人口，严重时可导致亡国灭种。

周朝禁“饮酒”之后催生了“饮茶”之风，“以茶代酒”“扬茶贬酒”逐步成为民间习俗所流传。较之于饮酒容易导致醉饮之果，饮茶不仅具有暖胃消食、养心修身、延年益寿的优点，饮酒常配以肉食、歌舞，故长期被斥为浪费钱财的奢靡腐败，而饮茶则被称为素业，封建王朝在政治治理也认为以茶代酒可以起到清正养廉的廉政效果。晋《中兴书》记载：卫将军谢安要拜访吴兴太守陆纳，陆纳拟以茶果相待。但其侄子嫌叔父小气，改用酒宴接待。谢安离去以后，陆纳大怒，打了其侄子四十大板，说“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8]以茶代酒常被误解为饮茶是比饮酒优雅的社交方式，饮酒必醉而丑态百出，饮茶则静谧舒适且健康养生。实际上发生茶进酒退、茶起酒落现象缘由有二：一是酿酒成本远高于制茶，前者耗费大量谷物而后者则创造经济营收，尤其高端奢侈类酒类的消费耗费了大量民生与财力；二是饮酒的直接负面后果远甚于饮茶，前者可能造成醉酒误事、酗酒伤身，而饮茶被认为有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之效。随着人类社会生产资料的日益丰裕及对多元生活的追求，饮酒与祭神的紧密联系逐步消解，饮酒不必是祭祀，凡人大至生老病死，小至交游喜乐都可以饮酒。饮的对象并非唯酒不可，饮水、饮冰、饮食等都可称之为饮，对象的扩展意味着饮的活动的

普遍化,“饮”这一生活形式返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并为其奠基,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交友聚会,都必然有饮酒、饮食或饮水等基本形式。

在未颁布戒酒律令的国家,饮酒是贯穿于神圣仪式与世俗生活的基本形式。在重要节日里“祭必酒,酒必祭”,饮酒是饮食活动的灵魂。饮酒作为宴会最重要的象征仪式,无论是祭拜鬼神,还是尊卑秩序,或者情感交流甚至利益交换,往往都在各种形式的祝酒、敬酒、劝酒中展开。饮酒不仅是庄重的文化表达仪式,也是独特的社会交往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发挥了诸如话语交谈、书信往来、身体互动等交往形式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上至国家大事可借助饮酒的形式顺利完成,如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下至日常琐事也以饮酒为表达形式,李白以“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来表达个人思愁;王维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表达了浓厚的前路珍重、依依惜别之情。现代社会饮酒也具有多重功效:一是置身于节奏紧张、压力巨大的当代生活境域,适度饮酒有利于释放职业焦虑、舒缓紧张情绪而实现身心放松的功效;二是有礼有节的饮酒是现代社交的重要形式,既能消除隔阂、促进互信又能维系关系、扩展友谊;三是酒业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消费产业,适度饮酒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岗位。虽然过量饮酒会产生酗酒伤身、醉酒误事等消极后果,全民过度饮酒也不利于强身健体与社会发展。纵观人类发展史,饮酒从来不是妨碍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所谓饮酒而“误国祸民”只不过是对真实历史进程的误解而已。饮酒活动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高度一致,合理饮酒是扩展人类生存的广度、挖掘人类生存的深度与增进人类生存的强度的重要方式,它已成为现代社会里一种成熟而健康的精神生活。

四、“饮”的礼乐世界

虽然自酿酒以来围绕着饮酒之危害形成了各种批评、否定甚至谩骂之声,诸如饮酒伤身、喝酒误事、酒色同行等污名化现象,但以酒为中心的行为却愈加繁盛,即使是历史上数次官方颁布禁酒令的特殊时期,饮酒也并未彻底绝迹。不仅官方依然在酿酒饮酒,而且民间各种形式的私酿也从未停止,饮酒本身也超越了单纯如进食之类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历经时代洗礼而经久不衰,酒文化也日益勃兴与滥觞。

究其根源,核心在于酒与礼的本质关联。“酒以成礼”是中华酒文化生机勃勃的根本原因,《礼记》曰:“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2]481}酒本身并无好坏福祸之分,但因酒生祸、以酒败德、借酒装疯之事却频频发生,原因在于酒与礼的相互割裂、二元对垒所致。为此,有必要澄清各种对饮酒的误解误读,彰显节制饮酒的社会价值,重申理性饮酒的礼乐之维,具体如下:

第一,因酒成礼,礼随酒兴。酒礼一体是古代尊崇饮酒的根源,以酒为中心的行为本质上是礼乐生活,是礼仪教化的现实展开。酒礼之间具有辩证关联,一方面,二者相互统一而彼此促进。古代乡饮酒礼极为强调礼法秩序,“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2]826}一套完整的饮酒仪式至少包含二十多个环节,既庄重严肃但又稍显繁文缛节,其核心环节是:(1)谋宾,即主人计划宴请哪些宾客,或依据年龄长幼,或依据德行高低来确定主宾与从宾身份,庄重的宴请需要撰写请柬并呈送。(2)迎宾,强调主人要站在大门外恭敬地欢迎来访宾客,在酒宴之前需要端茶送水。(3)献宾。

作为乡饮礼酒的核心,献宾首先是献,即主人向宾客敬酒,每次敬酒之前先净手,然后再洗酒杯,以示对宾客的尊敬。宾客饮酒之前要先祭祀,先喝一小口,然后再才喝尽杯中酒。献的环节完成之后是酢,它由宾客采用上述方式向主人敬酒,以示还礼。再次是酬,酬宾与献、酢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所用酒杯不同,且要主人自己先饮后才劝宾客随饮,以示对宾客参与这一宴请的致谢。

乡饮酒礼的目的不仅是向国家推荐贤才,也是通过这一公开而极具象征意义的仪式起到明长幼之序、扬养老尚齿、重伦理纲常的教化意义。《礼记》规定了长幼之间饮酒的差异:“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未酬,少者不敢饮。”^{[2]19}虽然乡饮酒礼存在着明显的宣扬等级尊卑色彩,也时常沦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工具,但这并不能否定乡饮酒礼在古代社会所特有的礼法治理功能。时至当下,我们虽不可全盘复制与沿袭古代传统的乡饮酒礼,但乡饮酒礼所蕴含的价值关怀与伦理导向,不仅有利于复兴中华民族的孝悌传统,而且有助于规范酒桌礼仪而防止滥饮酗酒等败德之事,孔子曾直言:“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2]653}

第二,以饮为礼,酒礼有序。《汉书·食货志》记载“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凡酒必饮,但饮酒的方式不同、程度不一、礼节各异,决定了究竟是饮以为礼,还是因饮损礼。理性而节制的饮酒方式是对酒礼精神的传承弘扬,相反任性而放纵的饮酒方式则是背离与损害了酒礼精神。饮酒方式与程度的差异决定了酒礼关系究竟是二元对立还是相互促进,具体而言:

一是饮酒的主体差异决定了饮酒行为的社会意义。“与谁饮酒”影响了饮酒的氛围与气象,可分为独饮、对饮与群饮三种方式。独饮是个体自斟自酌式饮酒,或是以酒遣忧,或是自我沉思,个中冷暖唯有自知。太白诗曰“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9]重温太白《月下独酌》可窥见独饮方式的现代意义,它为对抗弥漫在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提供了极具表现力的方式。事实上无论何种饮酒方式都有其内在价值,所谓“独饮得神,对饮得趣,众饮得慧”,真正的饮酒之乐不是贪恋酒体所散发的芬香,不是沉迷酒精所带来的麻醉,饮酒是个体表达自我心境的重要方式。

二是饮酒的具体情境决定了饮酒行为的礼乐意蕴。古人有“山饮”“水饮”“郊饮”“野饮”之习,不同的情境世界激发了不同的置身体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酒礼乐。《礼记·郊特牲》曰:“饮,养阳气也,故有乐;食,养阴气也,故无声。”^{[2]305}因饮养阳,故声乐相和助兴,饮酒活动中常有歌舞声乐相伴;进食活动是滋养修身,故强调静默无声状态。以阴阳二分来区别饮食之异,虽难免牵强之嫌,但对于涵养心性益处良多。古人饮酒反对醉饮,饮酒的目的在于“借物以为养”,而不能“身为物所役”。饮酒之时需讲究风度仪表,不能失态。《诗经·小雅·小宛》曰:“人之齐圣,饮酒温克。”这即是说,聪明智慧之人,饮酒保持节制与适度。《礼记·玉藻》言:“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2]367}酒过三巡则敬酒之人可以退场,既表达了礼仪也不至于醉饮,饮酒行为的核心不在于酒量高低,而在于礼仪是否到位,仪态是否得体。中国古代礼法始终强调理性饮酒的重要性,除了各类习俗律法的规范与要求之外,从古人对饮酒器皿的命名即可窥见其将饮酒与礼节密切联系起来。先秦时期青铜器饮酒器主要有“爵”“觚”“觯”“角”“散”等,《韩诗》说“一升曰爵,爵,尽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三升曰觯,觯,适也,饮当自适也。四升曰角,角,触也,不能自适,触罪过也。”^[10]先秦礼制以酒器来规范酒德,以“爵”为量是醒饮酒要

节制,以“觚”为量是提醒饮酒要“寡少”,以“觯”为量是提醒饮酒要适量。古代宴饮生活中通过对饮酒器皿容积的规定表达了对酒量、酒德的要求,礼乐规范前置并规范着“饮”的行为。“饮”作礼乐生活的关键环节,支撑着饮酒行为的具体展开,在这一动态变化而多元面向的饮酒活动中,彰显出酒文化的规范性与文明性。

第三,群贤会饮,同心共济。饮酒不仅饮食活动的基本形式,也是公共交往的主要方式,亦是生活文明的表现形式。“饮”内蕴着“通达”“顺畅”的维度,饮酒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顾虑、消除隔阂而实现坦诚交谈甚至畅所欲言的目的。自古至今,公共性饮酒就是主要的社交方式与公共生活,无论是家宴、便宴、国宴,还是中餐、西餐,几乎都将饮用酒水饮料作为重要环节。古希腊公共生活中人们在竞技活动或重大节日之际都要举行宴饮。在宴会上既有歌舞表演,又要歌颂诸神,同时还要举杯饮酒。荷马史诗中记载贵族、首领与英雄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战争与宴饮,“人们会聚王宫同宴饮,把歌咏聆听,个个挨次安座,面前的餐桌摆满了各式食品肴馔,司酒把调好的蜜酒从调缸舀出给各人的酒杯一一斟满。在我看来这是最美好的事情。”^[11]当然,宴饮是属于少数贵族首领们的特权,能参加这种宴饮活动是高贵身份的象征,也是重要的社交活动,甚至一些重要政治决策也是在宴饮活动中做出来的,同时也被认为是维持贵族阶层所崇尚的“平等”“分享”“荣誉”等价值观的象征。会饮与宴饮有所不同,它是以饮酒为主要形式的晚宴,但目的是在饮酒活动之中展开知识主题或其他公共话题的讨论,在今天“会饮”已经演化为探讨特定话题而召开的研讨会,类似于英语中的“seminar”一词。柏拉图与色诺芬都以《会饮》为题创作了戏剧,讨论了诸如爱欲、身体、心性、勇敢、智慧等公共话题。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饮酒进入到公共生活之中并担负着重要功能,已成为敞开公共空间、拓展交流渠道与深化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上至国家层面的宗教祭祀、礼仪庆典、内事外交等,下至社会层面的婚丧嫁娶、离别聚集、议事聚会等场合,“以饮酒来激发对天地、祖先的敬仰与缅怀之情,触发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可;以饮酒来庆祝公共事务的成功以及共同体的胜利;以饮酒来沟通人际情感、协调人际关系;以饮酒活动中的次序来体现社会等级秩序,强化人们对人际关系差序关系的认同,等等。”^[12]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形式的饮酒已超越了简单生理性的吃喝行为,它积极地表达了追思先贤、尊古敬祖的人生品格,体现了开心见诚、阔达大节的处事风格,发挥了同力协契、吴越同舟的集体精神。

酒文化传承至今而历久弥新,虽只是浩瀚广大的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支流,但以“饮酒”为中心的日常活动构成了极为平凡却至关重要的现实生活世界,它是中华礼乐文化的现实地基与意义之源。饮酒超越了单纯的感官刺激与外在的物化役使,潜移默化之间积淀为丰富而深刻的精神生活。在我们置身于信息化、流动化与加速化的当代生活境域之际,从形而上学的高度重思饮、酒与礼乐之间的内在紧张与文化张力,有利于克服现代性的焦虑及其诸种虚无主义的侵袭,开放个体的自由心境,激活豁达的生活态度。就社会建设而言,理性而成熟的饮酒方式能有效地释放社会压力,拓展公共交往的路径,是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参 考 文 献]

[1] 李学勤.字源[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 [2]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3]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297.
- [5] [唐]李白.[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179.
- [6] [明]施耐庵.水浒传[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358.
- [7] 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3.
- [8] [唐]陆羽,等.茶经译注(外三种)[M].宋一明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53.
- [9] 顾青.唐诗三百首[M].北京:中华书局,2009:6.
- [10] 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4.
- [11] [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M].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52.
- [12] 朱承.礼乐文化中的饮酒活动与公共生活及其现代意义[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6):161.

(责任编辑:谢光前)

Interpretation of "Drinking":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entered on Wine

PAN B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stitute for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1)

Abstract: "Drinking" is the basic form of human life, and the daily life centered on "drinking" demonstrates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life. "Drink" and "wine" have similar meanings and origins in glyphs,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glyphs reflect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behind dietary activities. "Drinking" belongs to eating activities, and "drinking" is equivalent to "eating wine". However,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n upgrade from the physiological activity of drinking and eating to complex spiritual life. Sinc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ancients advocated "where there is sacrifice, must drink" and "where there is drink, must be wine". Drinking carries a diverse cultural dimension and activates the inner vitalit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Li-Yue (ritual and music). A dualistic tension is formed between drinking and Li-Yue. On the one hand, the culture of Li-Yue is formed in drinking,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i-Yue is promoted in the process of drinking. Therefore, actively constructing a rational drinking culture will help stimulate the revival of public life and cultivate a mature public spirit.

Key words: drinking; wine; sacrifice; Li-Yue